

文化传播中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的体现

——以汉学家蓝诗玲英译《马桥词典》为例

郝军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译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通过对蓝诗玲所译《马桥词典》的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进行分析与研究,指出了其译作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受到广泛认可,是因为译者准确把握原语与译语生态,以译入语读者感受为要义,从宏观层面彰显译者责任,从微观层面在原语与译入语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以译者为中心,践行“忠实性再创造”的翻译原则,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不失流畅性,最终获得读者认可与接受。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译者责任;蓝诗玲;《马桥词典》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一直是翻译界研究的焦点。纵观世界翻译史,译者的地位、身份、主体性以及支配性等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Holmes 主张译者有权决定译文的内容、风格 and 意义。Lefevere 分析了意识、赞助人和诗学如何影响译者及其翻译文本。Even-Zohar 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换言之,译者不仅是译文的接受者,也是译文的生产者。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视角。在生态翻译学的建构与阐释中,从翻译链的角度来看,“译者中心”指的是翻译阶段的翻译实践,而不是译前阶段的翻译准备或译后阶段的翻译结果。也就是说,译者中心是指翻译过程或翻译操作或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翻译活动还是从通过译者的努力而翻译出来的文本来看,译者都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中心角色,发挥主导作用。

一、蓝诗玲与《马桥词典》

蓝诗玲(Julia Lovell)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曾就读于南京大学,获有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她在西方汉学界负有盛名,与葛浩文被并列视为英美文学翻译界的“双子星座”^[2]。她深谙中国文化,翻译过多部中国经典文学著作,包括《鲁迅小说全集》和朱文

的《我爱美元》、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张爱玲的《色戒》等,其中,《鲁迅小说全集》和《色戒》还被列入“企鹅经典”丛书,蓝诗玲的翻译能力及素养由此可见一斑。

《马桥词典》作者韩少功不仅是多产的作家,还是造诣颇深的翻译家。他的诸多著作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并在国外广为接受深得喜爱。《马桥词典》只是其众多著作中的一篇。这本书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一,这正是译者选取此文本的原因之一。蓝诗玲的英译本取得了巨大成功,其译作获得了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

二、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

胡庚申^[1]运用生态学“适应选择”思想阐释翻译,认为“适应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是翻译活动的领导者。在译者的指导下,“作者、原文、适应性选择与转换、译文与读者等”构成了一个循环的翻译活动。在这一翻译活动中,“适应性选择与转换”作为核心要素,是译者适应与选择的运作过程。其他相关或潜在的因素包括出版商、客户、评论家和赞助商等^[1]。“语言、交际、文化、社会”是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转换视角。此外,社会因素还包括美学因素、哲学因素和人类学等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译者主导的互动整体^[3]。以译者为中心主要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伦理层面的“译者责任”和运作层面的“以译者为中心”^[4]。

1. 伦理层面的译者责任

从生态理性的角度或宏观层面来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意识体现为译者的责任,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甚至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要对译文负责。具体而言,译者必须协调好翻译生态、翻译环境以及译文之间的关系,实现互动性和整体性的平衡^[5]。虽然译者和其他翻译要素有着同等的话语权,但其

他要素不能直接参与翻译过程,只有译者能够直接参与到翻译实践中来。因此,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意识正是译者责任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2. 操作层面的译者中心意识

“译者中心”理念主要体现于“译事中”的翻译行为。从操作层面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此后,译者又要依据翻译生态环境决定其对译文的选择^[4]。翻译活动中的一切翻译行为皆由译者判断和决定,这是“译者中心”的核心理念。

三、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在蓝诗玲英译《马桥词典》中的体现

生态翻译学认为,对翻译内外部环境的认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包括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3]。蓝诗玲作为汉学家,有其独特的翻译观。她十分重视翻译文学的生态环境。在文本选择方面,蓝诗玲倾向于翻译那些对他人或社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作品或者作品的内容涵盖全面或在未来有深远影响的作品。例如,她选择翻译鲁迅作品,很大原因在于鲁迅在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6]。

在翻译策略方面,蓝诗玲倾向于选择可接受性策略,原因在于她对翻译文学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一直处于边缘性地位有深刻的认知。她曾说,中国读者或许很难想象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边缘性。通读她的译作,读者可以发现,她通常是寻求英美文学经典形式库中现有的表达法,以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从而尽可能地缩小边缘性程度。蓝诗玲曾在《鲁迅小说全集》的“翻译札记”中提出“忠实性再创造”的概念。她总结说“总体上,我最基本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文”。但是所谓的忠实并不是绝对的、机械的。蓝诗玲把原作称为“创造”,译文的产生称为“再创造”。

1. 宏观层面的译者责任

“译者中心”意识表现于译者在翻译的

宏观操作过程中对译本的高度责任感,例如,要兼顾原作、原作者和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阅读习惯等^[5]。

在《马桥词典》的英译本中,蓝诗玲没有使用任何注释。在本书的序文中,她详细介绍了原作的主要内容、故事发生的背景,在译本的末尾,对书中所涉及的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和历史的相关术语进行了整理,以方便目的语读者进行资料查找或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由于《马桥词典》的创作所使用的方言及方言文化,给译者的翻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蓝诗玲在《马桥词典》英译本的“翻译说明”部分特别解释了“小说原文中有五个词条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强烈双关,如要翻译,势必要在英语中增加解释性词语”^[7]。因此,在征得原作者许可后,她对这些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词条进行了删译。因为这些内容如果强行译入目的语,非但不能有效保留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化韵味,还会给西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惑,进而影响译本的可接受程度^[8]。

2. 微观层面的译者主导作用

蓝诗玲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注意汉语和英语的区别,为了提高文化传播效果,在用词、句子结构、修辞等的翻译中将原语及译入语的语言生态环境因素纳入考量,通过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而且,考虑到中外读者的阅读习惯不同,她在翻译时特别关注中西文化差异,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忠实性再创造”的翻译手段最大程度地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

(1) 依归于原语生态的翻译策略

依归于原语生态的翻译策略是指译者在翻译原作时,通常倾向于选择高度异化的翻译策略,即译者通过适应原语生态环境,采用依归于原语生态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

例(1):男人再娶,把前妻叫作“前锅婆娘”,把续弦和填房叫作“后锅婆娘”^[9]。

“锅”这一词语在原文中多次出现,是马

桥土语中的一种称谓语,用以表示亲缘关系。译文中,蓝诗玲直接将其翻译为英语中“锅”的对应词“pot”^[7]。译者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并未添加任何解释性词语或通过脚注等方式加以阐释,译文读者却能够通过上下文基本理解词语所传递的信息,译文语言的流畅性得以保留。

例(2):只有悍夫刁妇才利欲熏心,下毒藤,放炸药,网打棒杀,实在是乌烟瘴气,恶俗不可容忍,不可容忍^[9]!

该句既有“下毒藤”“放炸药”“网打棒杀”这样的动词结构,还有“恶俗不可容忍,不可容忍”这样的旨在表示强调而使用的重复表达方法。译者为了使译语与原文保持一致,在英译过程中,保留汉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及特点,将其译为“Only the fierce and cunning will be blinded with greed, poisoning the water, setting off dynamite, casting nets, beating the water, ruining the atmosphere, vile evil practices, vile, vile, vile!”^[7]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力求使译文符合英语句子特点的同时,尽量保持原语语序、用词不变,以保留原语的语言特点。对句子中的重复手法在译文中也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处理,使读者能够领略汉语语言的节奏之美。

例(3):春天的雨是热情的,自信的,是浩荡和酣畅,是来自岁月深处蓄势既久的喷发。比较来说,夏天的雨显得是一次次心不在焉的敷衍,秋天的雨是一次次蓦然回首的恍惚,冬天的雨则是冷漠^[9]。

整个句子通过排比的句式结构形容春天的雨,比较不同季节的雨给人们带来的不同感受。同时,作者又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段将“雨”赋予人类所具有的属性。语言鲜活生动,节奏感极强。译者将其译为“Spring rain is enthusiastic, self - confident, it rushes and flows, it gushes from deep, long - held stores. Summer rain, in comparison, is more like an occasional absent - minded splatter, while autumn rain is an occasional, distracted about - face, and winter rain is simply indifferent.”^[7]

译者完全按照原文的选词、句法结构以及修辞等表达方式进行翻译。原作作者通过拟人的修辞手法打破了语言的界限,丰富了文本的语言美;译者也采用同样的修辞手法,保留了原作的语言形式美和文本美,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既丰富了读者的想象,也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汉语语言的文学张力。

(2) 依归于译语生态的翻译策略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文化、思想、政治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很难在译入语中找到完全对应的文化词汇、典故、习语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译文的可读性,译者不得不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依归于译语生态的翻译策略,即选择高度归化的翻译策略,目的在于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保证译文的可读性。

例(4):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是算不得数的,过了三个岁支,也就是三个十二年,就开始归根了,是贵是贱,是智是愚,是好是坏,到三十六岁以后见分晓^[9]。

“岁支”指的是“十二年”的意思。“天干地支”这种文化内涵为中国所独有,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与之相应的内容用以解释“岁支”。如果译者将其音译为“Suizhi”,西方读者就不会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因此,蓝诗玲采取能够为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的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翻译为“branches of age”^[7]。译文中,译者弱化了“天干地支”承载的浓郁文化色彩,只译出其所表达的含义。译文读者根据上下文完全可以推测出其语义,这样的译文不会对读者理解造成任何障碍。

例(5):有时顶多只说一个话头,人家一追问,他就得意地吊胃口:“你猜呵,你猜呵。”让别人永远听得不明不白^[9]。

“话头”和“吊胃口”是典型的马桥方言,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汇或表达方式,因此,蓝诗玲通过解释的翻译方法将这两个词在文中的含义表达出来,将其译为“one sentence would be the furthest he'd go”及“the smug taunts would begin”^[7]。尽管这两个词的准确含义并非如此,但译者对译文中必要

的信息进行了一定补充,以移植原文中内含的文化因素,同时又保留了原文的语意,这种译本更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和理解,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由此可见,蓝诗玲非常重视翻译生态,译文既考虑原语生态,又考虑译入语生态。《马桥词典》包含大量方言和特殊的政治文化元素,西方读者在阅读本书译文前对此可能鲜有了解。但译者并没有选择添加大量注释的翻译方式,相反,为了避免目标读者被译文中的注释打断,她选择在译文中不使用注释,从而给读者留以想象的空间和进一步查阅信息的机会。如果译者提供的背景信息对于译文读者理解原文信息至关重要,她认为可以通过尾注的形式将注释置于译文最后,从而保证读者阅读时的流畅通顺。

此外,为了增加文学创作的美感和节奏感,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使用了大量的重复手法,但英语中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重复。因此,蓝诗玲一方面通过替代、文化转换和解释等翻译手段避免重复的使用,另一方面尽量保留了原文作者为特定目的而使用的重复等结构,以使译文读者进一步了解汉语的语言特点。

四、结 语

一篇好的译文首先需要忠实于原文。然而,忠实并不意味着完全复制。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固有差异,如果译者固执地追求完全忠实,译文就可能不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因而很难被读者理解,更谈不上接受。文学翻译的本质是一种翻译活动,而不是创作活动^[10]。为了达到更好的阅读效果,译者需要在不改变原文意义的前提下,灵活地调整表达方式和语序。蓝诗玲经过大量翻译实践,提出了“忠实性再创造”的翻译原则,充分考虑了译文读者的接受度与译文的可读性,旨在为目标语读者提供良好的阅读体验,从而确保中国文学作品为西方读者所接受。

对于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首先应认清

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世界中的边缘性地位。中国译者应该优先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和译文的可读性,为中国文学经典创造合适的生态环境,培养潜在的译文读者。应把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译文的接受度放在首位,只有先让读者接受,才能获得被了解的机会。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遵循蓝诗玲所提出的“忠实性再创造”原则,在忠实于原文和易使目的语读者接受以及保证译文的流畅性之间寻找平衡点,最大化地依赖原语和译入语的生态环境,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权衡利弊,以译出读者易于接受的译文,进而消除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偏见,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2] 覃江华. 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观论[J]. 长

沙理工大学学报,2010(5):117-122.

- [3]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4] 胡庚申,刘爱华. 新的定位,新的发掘:从翻译适应选择论到生态翻译学[J]. 翻译界,2016(1):13-18.
- [5] 胡庚申. 关于译者中心问题的回应[J]. 上海翻译,2011(4):7-9.
- [6] 朱振武,唐春蕾. 走出国门的鲁迅与中国文学走出国门[J]. 外国语文,2015(5):108-115.
- [7] HAN Shaogong. A dictionary of Maqiao[M]. LOVELL J,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 [8] 岳中生. 译者生态位与“译者中心”[J]. 上海翻译,2019(4):14-18.
- [9] 韩少功. 马桥词典[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 [10] 许钧. 当下翻译研究的困惑与思考[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11.

The Embodiment of Translated – Centeredness and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Maqiao* by Julia Lovell

HAO 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Translators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prove that the key reas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translated version in the West of *A Dictionary of Maqiao* by Julia Lovell lies in the factor that the translator accurately balanced the ecology between the original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giving priority to the readers’ response. At the macro level, she did her utmost to fulfill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while at the micro level, she exerted translator’s dominance to achieve the optimal rendition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hrough abiding by the translation principle of “faithful recreation”. As a result, the translated version is not only faithful and fluent, but also acceptable by readers.

Key words: Eco – Translatology; translated – centeredness;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Julia Lovell; *A Dictionary of Maqiao*

(责任编辑:高 旭 英文审校:林 昊)